

《中州集》研究

导师：周勋初 莫砺锋 撰者：胡传志

《中州集》是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歌总集，是研究元好问。研究金代文史的重要文献，但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忽视了对它的研究。鉴于此，本文以《中州集》为探讨对象，力求全面地揭示其文化意义，分析其文献得失。

一、《中州集》的编纂动机与编纂过程

元好问在《中州集序》中称其编纂动机是收集金朝百年来的诗人诗作，在《自题中州集后》诗中又说：“平世何曾有稗官，乱来史笔亦烧残。百年遗稿天留在，抱向空山掩泪看。”可见，其动机是“以诗存史”（《四库提要》卷一八八）。

这一动机根源于效忠故国的遗民思想。虽然元好问在上耶律楚材书和为崔立奉表等事件中的举措颇遭讥议，但他能在忠君爱国意识较为淡薄的时代，在众多文人纷纷失节的环境中，坚守“金亡不仕”（《金史·元好问传》）的意念，保持封建社会至为重视的气节，在当时已是非常难得的忠义举动了。效忠故国的遗民思想与以“国亡史作”（《金史·元好问传》）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相结合，使元好问产生了以著述国史的方式来报效故国的观念。

这是一种全新的尽忠方式。元好问之前，遗民尽忠的方式有两种，或抗节而节，或隐居以终。这两种方式表现了人们的民族

气节和爱国情怀，具有相当高的思想、道德价值，但这两种方式往往不能为已经灭亡、无法恢复的故国做些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，从而局限了它们的实际价值。比较而言，著史尽忠的方式更可行、更符合文人的特点，也很有意义。它既能保全民族气节，寄寓故国之思，又能保存故国历史，体现文人的文化价值，保证朝代更易之际文化的承传与发展，推动史学著述，故为后代遗民普遍接受，元好问晚年潜心著史的意义就在于寄托效忠故国的思想。明乎此，我们就可以不必过多地计较元好问在此之前的气节得失问题，就能更深刻地理解《中州集》等著作的重要意义。

《中州集》是部具有野史性质的诗歌总集，它突破了前代总集作为“文章之衡鉴、著作之渊藪”（《四库提要》卷一八八）的一般意义，同时它又具备“一语不敢私”（《学东坡移居八首》）、“丝毫不相贷”（《中州集》卷十）的严谨精神，从而避免了野史“迂怪妄诞、真虚莫测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等缺点，洗刷了野史的恶劣名声，提高了野史的地位，显示出他独特的史学观念。

以诗存史还突破了传统的诗史含义，表现在四个方面，一是拓宽了诗歌反映历史的广度，二是它所反映的是断代历史，时间跨度超过了个人创作年限。三是以编纂诗歌保存历史，开拓了以诗存史的新途径。四是加强了自觉意识。创作不一定有自觉的诗史意识，而元氏编纂《中州集》则是一种自觉行为。这使得《中州集》的史学价值超过了前代总集。

《中州集》的编纂过程，据元好问《中州集序》和张德辉《中州集后序》（见元刊本、明汲古阁刊本），天兴二年（1233）五月开始编纂，海失迷后元年（1249）刊行，前后历经十七年时间，但实际上以写《中州集序》的天兴二年十月为标志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，结合编纂过程，可以解释众说纷纭的体例问题。

《中州集》前七卷的体例基本一致，但第八卷卷首标出“别

起”（此据元刊本、明汲古阁刊本）二字，第九、第十两卷中又出现“诸相”、“状元”、“南冠”等类别。对此体例，冯班、全祖望以及四库馆臣等人均有解释，但欠允当。结合《中州集》的编纂过程可以论定前七卷成稿于初期，因为：一、据《中州集序》，前期工作参阅了《国朝百家诗略》一书，而前七卷共收诗人一百零九位，这个数字与《国朝百家诗略》书名标示的百家相接近。二、第七卷入选了三十八位不知名的诗人，具有明显的补遗性质。三、第八卷标明“别起”，说明该卷是另一阶段的开始。可见，前七卷有《国朝百家诗略》为依托，在短时间内成稿，后三卷是长时间内断断续续增补而成，这是造成体例不一的客观原因。

元好问晚年渐渐加强的历史意识是形成体例不一的主观原因。《中州集》编纂后期，元好问有意加强《中州集》的历史特性。一方面将金源一朝重要历史人物加以分类，突出其某类属性，以便更有效地以诗存人，另方面大幅度增加入选诗人，从前七卷平均每卷十五、六人增至每卷四十六、七人，同时大量减少入选诗歌，由前七卷平均每卷二百七十多首减到每卷一百四十多首。这样，《中州集》后三卷更能体现编者以诗存史的宗旨。

二、《中州集》作者小传与诗选

元好问之前，晚唐姚合《极玄集》率先为作者立传，但比较简单，且没有诗歌评论文字，唐宋曾慥《宋百家诗选》将作者生平与诗歌评论结合起来形成小传，但该书小传“略无义类，议论亦凡鄙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五）。《中州集》的小传体例相当完善，对《列朝诗集》、《宋诗钞》等书影响很大。

但《中州集》作者小传的首要意义在于保存历史，因为古代诗人大多为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，故诗人小传几乎等于一代历史人物小传，小传达到了保存历史的目的，为《金史》、《大金国

志》等著作所广泛采用。由于《金史》等书仅采用其中部分资料，传抄过程中又难免鲁鱼亥豕之类的错误，如《金史·郭长倩传》抄录《中州集》卷八部郭长倩小传，将《昆仑集》抄成《昆崙集》，《大金国志·马定国传》抄成《中州集》卷一马定国小传，将阜昌（1130—1137）初年改成天眷（1138—1140）初年，造成时间错误。所以，《中州集》作者小传仍有补充、校勘《金史》的文献价值。

作者小传还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。第一，小传中保存了一些诗歌的佳句和残篇，使小传也具有诗选的性质。第二，小传保存了元好问的诗论资料，如卷三赵秉文小传评赵秉文诗，卷七马天来小传评马天来诗，都反映了元氏的诗学观念。第三，小传保存了一些金代诗歌批评资料，如卷二刘汲小转载李纯甫《西岩集序》反映了金室南渡前后的诗学思潮。第四，小传体现了诗史精神，记载了一些反映重要史实的诗歌，如卷八苑中小传所载之诗是其时黑暗政治的真实写照。第五，小传体现了知人论世的批评精神。

《中州集》是一部金代诗歌选集，其资料来源主要有别集、他人记载传闻、个人交往记忆等途径。《中州集》有可能参考了五十多位诗人的别集，从中选出了一千多首诗歌。在《中州集》所参考的别集中，完好地流传至今的唯有赵秉文《滏水文集》，这从侧面也反映了《中州集》在保存一代文献方面的巨大贡献。

《中州集》利用了一些对人记载和传闻资料，如李经诗选全部来自《滏水文集》卷十九《答李天英书》、任询诗选全部来自传闻。《中州集》还利用了一些交往所得的资料，如李汾诗选全部由元好问“就其少作、所能记忆者录之”。元氏对各种来源的资料都持审慎的态度，有时还做些校对工作，但仍然不免偶有失误，如卷三周昂《溪南》和《水南晚眺》两首五律仅有一联之差，本是一首诗，却被重复选入《中州集》。

资料来源不同，取舍比例也不一。从当时传世的别集中选诗的比例偏小，如王寂《拙轩集》现存一百九十首诗歌、《中州集》仅选七首，《潞水文集》现存六百三十六首诗歌，《中州集》仅选六十四首。这类诗选运用诗学标准，体现了元好问崇尚自然平淡和纵横刚健、反对奇险怪诞的诗学思想。传闻、交往所得的诗歌入选比例偏大。《中州集》中周昂的诗歌最多，达一百首，并不是因为其诗成就超群，而是因为其《常山集》当时已佚，只有其甥王若虚能记诵其诗三百首，也将失传，故《中州集》大量选取其诗。《中州集》中刘迎诗歌多达七十五首，也是因为其《山林长语》在金末已不多见。这类诗选运用文献标准，体现了元好问以诗存史的观念。

以文献标准选取诗歌，形成了《中州集》诗选上的一系列特点。一、入选诗歌数量与诗歌质量及编者的诗学思想没有必然的关系，如《中州集》入选较为罕见的党怀英诗歌六十四首，入选较为常见的赵秉文诗歌六十三首，在数量上不能反映两者水平的高下，也体现不出元氏对赵诗的偏爱。二、文献标准避免了诗学标准容易产生的片面性，使《中州集》诗选“不主一格”（《四库提要》卷一八八），较全面、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诗坛风貌。三、文献标准使《中州集》入选了一些与编者诗论相左的诗歌，如元氏反对奇险怪诞，却入选了李纯甫、李经等人效仿卢仝、李贺诗风的作品；元氏批评江西诗风，却入选了一些师法江西诗派的诗歌。四、文献标准使《中州集》兼顾众多普通诗人的诗作，但是，文献标准影响了《中州集》入选诗歌的水平，使《中州集》诗选质量参差不齐，招致了“去取尚不尽精”（《四库提要》卷一六六）的批评。

三、《中州集》的文献失误

文献失误包括资料遗漏和文献错误两个方面。

作者小传应包括字号、爵里、生卒、著述等方面的内容。如果传主本来就没有某一方面的内容，如别号、著述之类，或者编者不知道传主的某项资料，自然可以付诸阙如。但如果编者确知或可以考知的字号、爵里等，那就不应该遗漏。《中州集》大多数小传堪称资料详备，少数小传偶有疏漏。现根据内容分类，略加补正。

小传遗漏了宇文虚中、党怀英、秦略、王嗣等人别号。宇文虚中号龙溪，秦略号西溪道人，党怀英号竹溪先生，王嗣号遗安先生。小传遗漏了石抹世勳、侯册、杨邦基等人的籍贯。石抹氏籍贯，据《金史·石抹元毅传》，知是咸平；侯氏籍贯，据《归潜志》卷三，知是中山；杨氏籍贯，据《金史·杨邦基传》，知是华阴。

小传中遗漏生卒年的现象最为严重。小传所载生卒俱详的仅有党怀英、赵秉文等二十位诗人，仅详卒年的也只有蔡珪、刘迎等十四位诗人。可见，多数作者生卒不详，其中有两种情况尚待补正。第一，元氏确知而《中州集》遗漏者。如王庭筠去世后，元氏作《王黄华墓碑》，记载其生卒年，矛盾之处甚多。《中州集》不载，据《金史·王庭筠传》，王氏生于贞元四年（1156），卒于泰和二年（1203）。此外，王嗣、李纯甫、冯延登、冯璧、雷渊、李献能、王渥、邢具瞻、宗端修、赵思文、康锡、孙邦杰、靖天民、元德明、元敏之等人的生卒年都是元氏确知而《中州集》失载者。第二，《中州集》不载而可考者。其中有的诗人生卒年在《金史》等书中有记载，如宇文虚中、高士谈、蔡松年、施宜生、李晏、萧贡、王良臣、杨庭秀、王琚、张大节、张穀、吕子羽、王扩、杜充、虞仲文等人的生卒年均见于《金史》，无须考证，但有的诗人的生卒年则需要略加考证。通过考证，可以得知乔叟、周昂、刘昂（字之昂）、路铎、陈规、刘祖谦、石抹世勳、卢洵、滕茂实、姚孝锡等人的生卒年。

有的小传还遗漏了传主的重要经历，如蔡松年小传不载蔡松年制造皇统党祸、陷害君子党人这一重要经历，刘迎小传遗漏刘迎担任三年唐州幕官的经历，史肃小传遗漏了史肃担任南皮县令的经历。这类资料遗漏较多。所以，我们考察金代诗人，还必须参考《金史》、《归潜志》等有关史料。

《中州集》的文献错误可以分为两类，一是史实错误，一是传写刊刻之类的错误。

史实错误有：卷二张公药小传误以张公药为张孝纯之孙，应据卷九张孝纯小传所言，张公药为张孝纯之子；卷五庞铸《田器之燕子图》诗末小注所引李纯甫之诗实为赵秉文所作，见《滏水文集》卷八，题为《燕子图》三首；卷八宋楫小传载宋楫泰和三年伴梁肃使宋，据《金史·梁肃传》，使宋之事在大定十四年；卷八路仲显小传以伯达为其字，据路伯达《冀州节度使王公重修庙学碑》（《金文最》卷七十五），伯达是名，仲显才是字；卷八宗端修小传以宗氏于丑绍王时期避世宗讳，改宗为姬，据《滏水文集》卷十一《盘安军节度使姬平叔墓表》和《金史·宗端修传》，宗氏是在金章宗时期避金睿宗讳改宗为姬的；卷十姚孝锡小传姚氏政和四年登科，据王寂《拙轩集》卷六《姚君哀词》、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十一，姚氏应于宣和六年进士及第。

传写刊刻之类的错误有：卷首金显宗《赐石右相琚生日之寿》题下小注曰：“大定辛酉承华殿书”，大定年间无辛酉年，结合《金史·石琚传》可知辛酉为辛丑之误；卷二任询小传以任氏生于处州，应据元刊本《中州集》和《金史·任询传》作虔州；卷三党怀英小传载党氏任成阳军事判官，然金无成阳，据《滏水文集》卷十一《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》，成阳应为城阳之误，小传又称党氏“为政宽简不言而人化”，据上引墓碑，“不言”当为“不严”之误；卷三王庭筠《被责南归至中山》题下注曰：“丙申春”，据《莫华集》卷八、《金史·王庭筠传》，丙

申为丙辰之误；卷四周昂小传载周氏任龙州都军，然金无龙州，龙州当为隆州之误，有《利涉道中寄子端》诗为证。

以上仅是些可以考知的文献失误，此外还有少数不可考知的文献问题，如李献能的及第年龄、王中立的享年，《中州集》和《续夷坚志》记载不一，是非难辨。又如卷四李纯甫《为蝉解嘲》诗题下小注，语意不明，疑其有误。

当然，这些文献失误只是白璧之瑕。本文指出这些失误，旨在使其文献价值更臻完美。

四、《中州集》的流传和影响

《中州集》问世以后的际遇几度浮沉、颇多坎坷，原因是时代风云牵系着《中州集》的命运。

《中州集》成书后，即因财力困难和不被时人理解等缘故，几经磨难，才得以刊行。刊行时，元好问的老朋友、官运亨通的张德辉作《中州集后序》，将《中州集》与王安石《唐百家诗选》、曾慥《宋百家诗选》并列，对选诗不精的《中州集》颇有微辞。这说明，张德辉并不理解旨在以诗存史、效忠故国的《中州集》。《中州集》于元好问在世之时并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。

元好问去世后，情况未见好转。郝经撰《遗山先生墓铭》称“《中州集》百余卷”，似乎对《中州集》不甚了了。稍后，家铉翁高度评价《中州集》，但其评价具有一定的偶然性，并且没有把握《中州集》以诗存史这一核心。《中州集》在元初影响不大，到至顺二年（1331）已是“流传不广，人莫之觐”（余谦《遗山集序》）的罕见著作了。元代史臣采用其资料著述《金史》，却没有充分评价《中州集》。

明代初年至明代中叶，《中州集》影响仍不显著，王世贞对《中州集》及金代诗歌评价较低，胡应麟将金诗列入《诗薮·闰余》之中。他们都没有认识到《中州集》的诗学意义和史学意义。

《中州集》在元、明之际的命运主要由元、明统治者对金朝的偏见所造成的。

明末，《中州集》的地位有所提高，程嘉燧最先认识到《中州集》“以诗系人、以人系传，中州之诗，亦金源之史”（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序》引）的价值，并编纂《中州集钞》，钱谦益为之作序。钱氏后来还仿效《中州集》编纂《列朝诗集》。程、钱等人的推奖和模仿，再现了《中州集》以诗存史、效忠故国的思想价值。可见，《中州集》的价值直到与其诞生的时代性质相近的明清之际才被世人所认识，是时代发现了它的价值。

当时，冯舒、冯班有感于明末现实和《中州集》的影响，对《中州集》作较细致、较深入的批评。二冯批语由清人章钰过录在明汲古阁刊本上，藏北京图书馆。

二冯批语注重挖掘其效忠故国的遗民思想，如对《中州集》体例的解释就说明了这一点。他们激烈批评金末浮薄的士风，批评元好问晚节不终，表现了他们身处末世的心态，但二冯过于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深求效忠故国的思想，反而曲解了元氏的良苦用心。

二冯批语具有较高的诗学价值，表现在三个方面：其一，从总体上把握金诗的成就，认为其成就不及南宋诗歌。其二，联系明末现实批评具体作品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其三，反映了二冯的诗学思想，如严辞批评江西诗风，就是他们一贯的诗学主张。

清代，由于《列朝诗集》再现了《中州集》效忠故国的思想，触犯了清代统治者的禁忌，所以，随着《列朝诗集》被禁毁，《中州集》也引起了许多批评。

王士禛最先开启非议《中州集》的先例。他将《中州集》与《列朝诗集》联系起来，批评“元书大有纰谬”（《池北偶谈》卷十一），否定《中州集》以诗存史、效忠故国的思想，从而造

成对《中州集》理解的退步。此后，金祖望、沈德潜等人都没有认识到《中州集》的思想价值。

《四库提要》对《中州集》作出了有清一代最权威的评价。它认识到《中州集》“以诗存史”的特点，并分析其“存一代公论”的史学价值，指出王士禛所批评的缺点只是“白璧之瑕”，这一评价要公允一些。但《四库提要》又批评《中州集》“不主一格”（卷一八八）、“去取尚不尽精”（卷一六六）、“所录未能赅备”（卷一九〇）等缺点。没有肯定其效忠故国的思想。后人大多祖述此说，很少发明。

有清和金源同出于女真族，故清廷较重视金源文献，对金代诗文也多有肯定。清廷不赞赏《中州集》，主要归因于《列朝诗集》的连累。

总之，《中州集》价值之隐现，地位之浮沉都与时代风云息息相关。元明之际，由于政治偏见，人们对其价值和意义视若不见，明末清初，时代变易，突现出它以诗存史、效忠故国的思想，但它又不为清代统治者所赞可，所以，至清代中后期，其思想价值再次湮没不彰，甚至直到今天，也未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